

剖析浙江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现象

许经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民间借贷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融资领域。金融危机往往率先在非正规的民间借贷领域爆发。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借贷风险要大一些。因而,当货币政策宽松、国有银行向部分民营企业贷款时,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大多要求民营企业间建立互保联保制度。这种制度在货币政策宽松、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应当说是一种较好的担保形式。但是,当货币政策趋紧、民间利率攀升、经济增长持续减缓时,就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不仅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垮了,经营效益好的企业也难以幸免。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多米诺骨牌现象。

[关键词]民间借贷;金融风险;多米诺骨牌现象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3)03-0041-03

温州是全国民间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约有89.2%的家庭、59.6%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与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滑有很大的关系。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2年5月,温州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指数同比为84.9%,二手房价格指数同比为82.9%,成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温州房地产价格相对于高峰时普遍下降35%以上,部分高档房下降50%。当然,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可追溯到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全国性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在当时信贷极其宽松的背景下,温州许多企业拥有充足的银行资金,但是由于外需疲软,成本上升,依旧很不景气。因此,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这笔钱很大部分被投入房地产领域。2011年温州全年完成房地产投资680.58亿元,同比增长151.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行信贷政策放宽,一部分民营企业相对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虽然其成本要比国有企业高得多),从而大规模投资,发展生产。从买地、建厂、投产、产出到回收成本,这个周期往往要经历3~5年,然而企业扩张周期尚未完成,国家政策又突然转向,银行随之收紧银根,许多企业续贷被取消,或者被大大压缩。这就必然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危机因此全面爆发。

首先,温州的债务危机,在金融链条上,表现为民间借贷市场危机。民间借贷市场进入门槛最低,风险控制意识淡薄,制度缺失,成为债务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

其次,温州的债务危机表现在,信贷领域互保联保多米诺骨牌倒下。互保联保是当前我国信贷领域通行的规则。这种规则的局限性在于波及面很大,当某个行业、某个地区资金链出问题,因为此时银行即刻向借方停贷、抽贷,导致互保联保圈内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最终把尚能支撑的大企业也拖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12年5月末,浙江省发生信贷风险的企业中,有60%的企业是由于为其他企业担保代偿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目前浙江省所有企业贷款中,有40%是通过互保联保形式贷款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温州曾经流行抱团取暖(互保联保)的经营模式,随着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这一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以往的惯例,少数有可能从银行贷到钱的民营企业,也必须有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的担保联合体,其中1家民营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企业须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即当某企业还不起银行贷款时,联保企业必须承担还款连带责任。例如,温州市某电器企业发生危机,波及为其提供担保的5家企业。银行在发生贷款风险时,一贯采取“风险转移”措施来化解自身风险。信贷危机发生后,各大银行不管贷款期限是否到期,竞相采取相应措施,就是让担保企业先行偿还,即从提供担保企业的银行账户上直接扣划所应偿还的银行借款。通过互保联保措施,银行的风险化解了,但提供担保的企业债务却有可能一夜之间骤然猛增,导致实业型企业倒闭进一步加剧。以浙江省奥德康仪器仪表公司(简称奥德康)为例,2011年在温州、乐清引起轰动的三旗集团

[收稿日期]2012-08-03

[作者简介]许经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危机中,奥德康正是当时为三旗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之一,其总经理郑巨飞后来因为该公司偿付了浦发银行和温州支行共计685万元的担保额度,迫使奥德康不得不以2000万元的价格卖掉赖以生存的厂房,并偿还所欠某国有银行温州分行1500万元债务以及其他社会上的高利贷,使资金链越绷越紧。终于在2011年9月2日,郑巨飞被乐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出现因联保制度引发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不少像奥德康这类企业,一方面是本企业资金链高度绷紧,另一方面银行不再继续给予贷款甚至提前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骤然断裂,丧失融资能力和还贷能力,造成恶性循环。正是民营企业之间庞大的联保互保网络蔓延,引发大面积资金链断裂。又如2012年8月5日,浙江省诚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之所以在办公楼坠楼身亡,是因该公司与温州最大的眼镜业老板胡福林在浦江县的光伏企业互保联保,后者还不上钱,产生连锁反应所导致的。

每年7月份,是银行还贷较为集中的时点。2012年7月,因信贷互保联保引发的连环性信贷危机在杭州出现了。杭州地区600家知名民营企业因此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求助,恳请省政府帮其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这意味着浙江省民营企业界又再次发生新一波民间借贷危机。浙江省互保联保网络风险触发点始于2011年12月12日,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下属的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该公司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2012年1月起,受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信用不良影响,为其担保的多家企业开始被多家银行强制收贷。与天煜建设有限公司相互担保的企业,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上百企业受牵连,受到来自银行的抽贷、催贷压力。2012年6月14日,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中江被刑拘;2012年3月28日,浙江中科迈高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洪汉民“跑路”,被浙江省安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以“涉嫌骗取银行贷款”为由立案调查,共涉及法人单位达600~700家,资金数百亿元。目前,因互保联保引发的信用危机,正在席卷浙江省内各银行,传统的互保联保风险控制手段,催生着前所未有的信贷新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行信贷政策放宽,一部分民营企业相对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虽然其成本要比国有企业高得多),从而大规模投资,发展生产。从买地、建厂、投产、产出到回收成本,这个周期往往要经历3~5年,然而,企业扩张周期尚未完成,国家政策突然转向,银行随之收紧银根,许多企业续贷被取消,或者被大大压缩。自从国家调控房地产以来,浙江家具行业成为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当发现互保危机后,部分银行即减少对家具行业几千万元贷款,随后又要求企业先还清贷款,尔后再贷,但银行一收走贷款就不想

再贷了。应当这样看,互保联保是在经济宽松、信贷过度宽松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信贷模式。这种模式同时绑架了银行和企业。浙江家具行业深陷其中。在互保链源头波及的大小公司中,包括嘉逸集团及其子公司新洲家具、荣事实业、博洋家具、浙江晶瑞办公家具、麦尚实业等在内的知名家具企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连锁反应。自从嘉逸集团被银行收贷后,其旗下子公司新洲家具的资金就开始吃紧,部分外贸出口业务的付款开始出现逾期的苗头,包括建设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对新洲家具收贷、停贷,并重点关注,跟踪调查。这是一波互保圈连环性危机,涉及范围相当广泛。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在正常年景下的风险调控系统,未必在高风险时代也能行之有效;相反,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一些本来还可以正常经营的企业,就是因为互保联保而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问题在于政府无权强制银行将企业还贷期限往后推。银行催贷、抽贷是面对信用危机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以往的民间借贷更多的是通过担保公司,但是这种平台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当前经济形势难言乐观的大环境下,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超过一半的担保公司停业。其原因有:一是很多担保公司不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二是商业银行放贷更加谨慎,令担保贷款门槛随之提高;三是担保公司本身在金融体系中处于弱势和从属的中介角色,对大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上面是银行,下面是企业,无论哪一方的风险,都会影响担保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村镇银行的建立面临重重难题。2012年银监会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同时承诺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实施意见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要求由20%降到15%,同时明确村镇银行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后,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按有关原则调整各自比例,发起行可以减持甚至全部退出村镇银行。央行还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尽管如此,温州金融改革已经超过100天,至今还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可见道路之坎坷。

当前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既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果,也是2008年信贷狂飙后的苦果。在完成四大行改制上市后,中国银行业连续10年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转折点是2011年年底,那时的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不到1%,此后便出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在经济下行压力渐增的背景下,凡是民营经济较为活跃、外贸依存度较高、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攀升就特别快。2012年5月末,浙江全省的不良贷款在年初基础上突然增加181亿元,不良贷款余额接近700亿元。随之而来的是银行的停贷、抽贷,使民营

实体经济雪上加霜。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同样严重地威胁着金融安全。浙江温州这个被人们视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敏感地区,在经历连续12个月不良贷款上升之后,深感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独善其身。据统计,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3月末为1.99%,4月末为2.27%,5月末为2.43%,6月末为2.69%。2012年4月末,温州工、农、中、建等分行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上升7.3亿元、5.4亿元、7.9亿元、3.4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4%、1.38%、2.19%和2.278%。温州银监局透露,截至2012年6月末,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高达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9%,比年初上升1.3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月持续上升,创近10年来新高。资料显示,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0.37%,成为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级市。不到一年时间,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跃居全国之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良贷款不等于呆账。因为可以通过资产抵押清算,实际呆账约9亿~10亿元(占5%左右)。前不久,央行向全国金融机构发出通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防止非法集资、高利贷、金融传销、民间融资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密切关注具有金融功能的非金融机构的风险,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非金融机构融资活动的监测分析,加大对非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引导其规范发展,努力做到各类风险早发现、早提示、早处置,防止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风险乃至系统性风险。应当指出的是,当前金融领域面临的问题,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严重得多。当时制造业企业信用崩盘发生的面积较小,地方政府又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对出现问题的制造业企业出台了免税等优惠政策。而在当前大背景下,民间借贷危机带有全局性,地方政府的扶持能力极为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看蓝天白云就可以判断温州工业景气的程度。近几个月来,温州呈现蓝色的天空,从某个角度昭示着大量工厂减产停产。2012年上半年,温州有60.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减产停产。目前全停产企业有140家。2011年下半年爆发“跑路”潮后,温州企业老板大多数是硬撑着。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中,平常有10多家公司,目前大门是开着,办公室也有人,但实际上并没有生产。门必须开着,为的是防止别人来要债。随着企业减产停产,银行不良贷款率便迅速上升。这与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大规模萎缩,市场上很难找到借贷资金有很大关系。以往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之所以低,得益于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企业出现资金缺口,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融通、垫付等方式解决。不到一年时间,温州民间借贷由过热到过冷,市场萎缩70%~80%,现在的温州已经不说民间

借贷这个概念了,企业要从民间借贷市场借到钱,比向银行贷款还要难,已经演变为全面信用危机。现在的温州实体经济萧条,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改革无论怎么搞,不实现产业转型,不解决实体经济问题,什么都是白干。四年前财政政策刺激政策出台后,温州靠着房地产炒作,维持虚假繁荣,而潮水退后,产业转型停滞不前,如今,投机做不了,实业也做不了。近来因为各大银行对浙江民营企业集中催收贷款,杭州600家知名民营企业向浙江省政府求助。2012年8月上旬,中央银行发出通告,要求各级银行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目前中国企业负债已占GDP的107%,如果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是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如果经济出现波动甚至明显下滑,部分企业就还不起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会迅速上升,金融危机就有可能发生。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缺乏活力,过度依赖政府的救市政策。这两年中国的救市政策虽然使经济没有出现硬着陆的后果,却没有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势头。社会避险情绪日益浓厚,“预防性储蓄”不断强化,大家都采取“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造成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消费不足,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传递到实体经济部门,不能达到创造有效需求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似乎进入“流动性陷阱”的时代,进一步的政府刺激政策将会导致未来流动性泛滥的巨大后遗症。

温州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金融结构性问题,毋宁说是实体经济问题,即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与民间金融快速发展之间严重不匹配,导致产业空心化、金融虚拟化。当前温州的实质问题,不是金融供给短缺问题,而是“以钱生钱”、借钱搞投机。宏观经济减速、外贸需求不足、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民间借贷危机后遗症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温州实体经济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疲软时期,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减税让利、减轻企业负担的财税政策,把实业救活,并有效限制金融炒作。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尽管我国宏观经济进入稳增长周期,央行连续降息、降准(存款准备金率),释放货币适度放松预期,但由于实体经济发展无力,缺乏有良好预期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不会像以前那样,货币政策一放松就大幅度提速。不少银行出现罕见的贷款难。与其相联系,由于实体经济找不到适宜的投资项目,大量资金愈来愈脱离实体经济领域,涌入虚拟领域炒作。其背后是实体经济的“关、停、并、转”。2012年7月底,温州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就说明了实体经济领域处境之艰难。

[责任编辑:付钦太]